

中国诗学精神

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

刘士林〇著

海南出版社

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

LiuShiLin Zhongguo Shixing Wenhuax Xilie

中国诗学 精神

Zhongguo Shixue Jingshen

刘士林◎著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学精神 / 刘士林著.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6

(刘士林学术文集)

ISBN 7-5443-1719-6

I. 中... II. 刘...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62156号

中国诗学精神

责任编辑：刘 逸

执行编辑：潘 良

装帧设计：Metis 灵动视线
111-010-85983452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 编：570216

发 行：010-88865482

邮 购：0898-66830933

E-mail：hnhongshulin@126.com

印 刷：莱芜市圣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06年7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7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

字 数：250千字

印 数：4000册

书 号：ISBN 7-5443-1719-6/I·71

定 价：29.8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版、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刷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调换

总序

世纪残照，千年熹微，所谓古今气运一大迁移者，其物是人非、阴舒阳惨之状，不可胜言矣。初，余迫于生计，栖身汴都。方尺陋室，蜷曲窒碍。然环堵皆书，朝夕寓目，意态昂然，不改其乐。感百年苍黄，思返本开新，以吾中华文化之本体俱存于诗学之统系，大异西方诸国诸族，始首倡“中国诗性文化”之新理念，时值年少英发，撰《中国诗哲论》（即丛书之《中国诗学精神》）、《中国诗学人类学》（即丛书之《中国诗学原理》），及《中国诗性文化》三书，期深究天地万物之心，以明吾族吾民之性。其间困顿曲折，暮鼓晨钟，难与外人道。

“时俗易人，贤者有所不免”。且余非贤者，焉能特立，故持论颇浸溉于西方现代哲士，而今返求诸己，终有悔意存焉。然春秋代序，南北鸿迹，惟此诗性文化之理念，未尝与世推移，是为人生之一大快意事也！旧版凋蔽，诸本多不复见，承蒙友人相惜，佐以文集行世。遂手校一过，复蒐集零丁，裒成一帙，是为《中国诗词之美》。此乃《中国诗性文化系列》之所由出也。

昔王者有言：“不及百年，其礼先亡”。诗学亦然。每念及此，百感茫茫。《易》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又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近世以降，议“文艺复兴”者甚众，果如彼，其为中国诗性文化之复兴乎？果如彼，则不负余十载朝夕惕厉之苦，亦有以报师友之语默教诲矣。是为序。

曲阳士林丙戌年二月二于沪上康健园畔

目 录

绪论 中国文化的诗性文化	(1)
1 精神方式	(1)
2 诗性文化	(3)
3 诗的情结	(5)
4 天地之心	(9)
5 《诗经》：周代文化的百科全书	(15)
6 历史冲突	(18)

上篇 本体论诗学导论

第一章 我存在的本体	(24)
1 烟云往事	(24)
2 存在与虚无	(26)
3 欠缺与永恒	(30)

第二章 诗的本体论结构	(34)
1 诗是什么	(34)
2 诗如何是	(38)
3 诗的本体论结构	(41)

第三章 “自然历史过程”	(45)
1 有关论述	(45)
2 一种信念	(48)
3 苦难的历程	(50)

下篇 中国诗哲的本体论诗学研究

第四章 中国生命智慧的苦难发生机制	(54)
--------------------------	-------	------

1 从原始思维的视角看	(54)
2 庄子的《庄子》	(55)
3 黄金时代寻梦	(61)
4 痛苦的智慧	(66)
 第五章 眇眇兮愁予的宇宙意识 (71)	
1 沉寂了三百年以后	(71)
2 青铜心态	(73)
3 诗言志	(79)
4 智者与水	(83)
 第六章 旷世不再鸣的本觉真心 (86)	
1 在受难中的鲜艳与圣洁	(86)
2 变徵之音	(87)
3 东方“拉奥孔”	(91)
4 林无静树 川无停流	(95)
 第七章 人淡如菊的自然本体 (98)	
1 “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	(98)
2 归去来兮	(99)
3 五柳先生和桃花源	(102)
4 平淡 自然 本真	(105)
5 回归自然简议	(107)
 第八章 飞扬跋扈的酒神精神 (109)	
1 “舍白之外，孰能有是气乎”	(109)
2 中世纪的浪漫骑士	(111)
3 立德 立功 立言	(113)
4 酒神的歌声	(118)
5 痛饮生命之华筵	(120)
 第九章 百年多病的日神精神 (122)	
1 日神的云彩降落何处	(122)
2 酒神的式微	(123)

3 隐忍、负重的道德哲学	(126)
4 为经为骚复为史	(129)
5 形式冲动	(132)
第十章 落尽豪华的存在哲学	(135)
1 是什么在支撑着他	(135)
2 承平时代的悲剧人生	(137)
3 超世人世界观	(140)
4 游于艺	(142)
5 人间有味是清欢	(145)
第十一章 倩魂消尽的忧郁本质	(148)
1 “三生慧业，不耐浮尘”	(148)
2 便无风雪也摧残	(149)
3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154)
4 进亦忧 退亦忧	(158)
第十二章 白茫茫大地的虚无情综	(162)
1 一国之文化精神集于一人之身	(162)
2 顽石 宝玉 生命本体	(164)
3 悲凉之雾 遍被华林	(168)
4 此在的苦难与永恒	(173)
第十三章 自啮其身的悲剧知识	(177)
1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177)
2 “悲剧的知”之成熟	(179)
3 人性之坟	(183)
4 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	(186)
5 敢有歌吟动地哀	(191)
第十四章 结论：思想史与诗学史	(193)
1 “命运的谜语”	(193)
2 思想史与诗学史	(194)

附篇 昨夜书中得故纸

- 第十五章 思维方式深层变革的产物 (198)
- 第十六章 旧游时节好花天 (204)
- 第十七章 饮之太和，独鹤与飞 (210)
- 后记 徒从绮语见情多 (215)

绪论 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

1 精神方式

与一种完整的文化形态共存亡，必有人（族类）一种统一的精神方式。源远流长，且必将生展向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其精神方式究竟表现为什么呢？过去有诸如政治文化、伦理文化、乐感文化等说法，这些当然也都把握住了其部分特质，但尚不能看作是对传统文化精神本体的把握。正如海德格尔在谈论科学时所指出：“诸种科学都是人的活动，因而都包含有这样存在者（人）的存在方式。”^① 中国文化的本体也必定以其特有的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中国传统精神本体的那种存在、那种结构、那种方式，我是这样看待的：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中，它是作为化基因库而存在的，其中储存了各种有着必然联系、相生相克，并必将随着历史发展而物态化、现实化的文化因子或精神潜能。它们在外化、展开、绽放之前，以一种高度统一的方式构建了人们原初生活和精神的和谐，而在其后漫长的历史行程中，这个基因库里的各种文化因子则纷纷在现实提供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粉墨登场，使尽解数，“尽性”之后，才以薪尽火传的方式被其他新的精神方式、以及更有生命力、更能适应生存环境、更加优化的文化基因取而代之。而那些新的基因，也必定以与前者有着血脉联系的精神方式来表达自身。而且，作为一种类似有机体生命过程的文化的进步与成长，其精神方式必定也在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花繁叶茂，青春似锦，尽得天下之美，从而一跃达到该种文化的峰顶，然后才日渐衰老下去，直到一种新的文化及其精神方式在它的夕阳残照中诞生。只有这样的事物，才能担任起我所谓的文化本体。也只有这种文化本体，才能有一种统一的精神方式。

^① [德]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等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页。



以这种文化本体观去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心有灵犀，就会一下子驱逐那些长期围绕我们心灵和思想的精灵或幽灵，而毫不迟疑地说：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我们民族的精神本体主要是以诗的方式来表达的。其中虽有沧桑变迁，但改变的只是形式、外观，而其深层结构，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可以说从未发生过重大变异。王国维先生曾谈到中国文化诗本体的一些表现形式的变更情况：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化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人间词话》）

当然，线索在这里大致上已清理出来，但结论却未必深刻、全面。若依本书著者的观点，在中国传统精神方式的历史必然行程中，接着“词”这一表现形式的应该是元曲、明清小说和五四新文学，其核心主线是中国诗性精神的历史消亡。关于文学艺术的兴衰、消长，新旧交替，除去人们过去已烂熟于心的物质基础、现实生活的制约之外，就精神本体的精神方式而言，仍有着特殊的、与物质生产方式很不相同的内在精神规律。正如马克思曾指出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存在着不平衡规律一样，还可进一步引申的是，两种生产的不平衡主要是由精神本身的特殊规律（精神方式）造成的。而在物质生产方式自身不发生重大变迁的社会结构中（如中国古代农业社会），这种精神方式自身的作用似乎更大、更直接和具有决定性意义。以此观之，王国维先生所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和难出新意，则只是就文学艺术这一文化表层结构的揭示与显发，而其“始盛终衰”的深层必然性则在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①进而而言之，不仅是社会的经济形态，在文化形态及其精神方式上也同样如此。以中国诗学为表意与象征系统的中国诗性文化及其基因系统，从远古世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8页。

的“生意盎然”、经盛唐世界的“繁花似锦”、到明清以降的“红颜枯槁”，这一悲剧历史进程向人们表明的就是，当一种文化本体固有的各种基因与可能性，在经过各种方式的努力与建构之后，最终必然要退出历史与精神舞台这种历史运动的必然性。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使人联想到顾炎武以暧昧语言所讲到的诗之“势”：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日知录》卷二十一“诗体代降”）

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根本没有办法避免的。而顾炎武所说的“势”，则与马克思等人的“自然历史过程”理论有某种深刻的类似性。在今天，将这种“自然的必然性”转化、提升为一种“自觉的必然性”，即自觉地意识它、把握它，为推动社会进步提供理性的思想与精神资源，无疑是新一代知识者的学术与历史使命。本着这个目的，本书将以中国诗学为对象，以沉淀于其中的中国诗性文化及其精神方式为核心展开探索，在建构与阐释中国传统精神本体与深层结构的基础上，从精神方式的层面阐释其走向工业文明的艰难历程，回答“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等现代性问题。

2 诗性文化

从精神方式入手，在前文粗糙的描述中，实际上就已提出“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这样一个新问题。在此可以对它作进一步的表述：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国诗词”为文本形式、以“中国诗学”为理论系统，以及以“诗性智慧”为哲学基础的一种诗性文化形态。诗性智慧的集体无意识或文化原型，诗话词话的古代文论或中国审美思维，以唐诗宋词为中心的感性载体或文学生产方式，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文化独特的深层结构与外观形态。从诗的本体论角度，不仅可以更深刻地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兴盛和衰落，也可以更直接地体验中国古代民族的欣喜与悲伤。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生产方式等实体性文化形式不同，诗性文化是以更深邃的方式影响、规定、制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源远流长、根系繁昌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伴随着其“诗本体”这一精神方式而诞生、成长和消亡的。《诗经》曾描述了中华文明的文化起源与上古生活世界，《全唐诗》以浩繁篇幅记载下中国传统文化在其鼎盛时期的豪华情景与豪迈风度，同样，在《红楼梦》中它也以“诗与美”的最终破灭宣告了“诗本体”自茫茫大地般的虚无及传统文化凄惨暮年的来临。在中国古代历史与世界中，

真正印证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宣称的“诗是一种比历史更高级的东西”。而中华民族之所以与“诗”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血脉联系，也是因为他们的精神生命始终都扎根于中国诗性文化的氤氲世界中。

现在，让我们略来谈一下如何理解诗性文化概念。对于任何概念的理解，最重要的是一个适当语境的确立。对于诗性文化概念来说，首先涉及到的是文化这个概念。众所周知，文化概念在内涵上非常复杂又莫衷一是，但从精神方式的角度出发，本书侧重于在人文精神层面上理解文化。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否认精神文化的物质基础，而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把它们首先“悬置”起来。对“物质”与“精神”感兴趣的读者，也尽可从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获悉，因为这两者的关系早已被很多人精研细究过。至于为什么可将之“悬置”起来，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是在以农业文明为主导性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发生与形成的一种相对统一的精神方式。物质生产方式的相对稳定，也直接导致了社会结构与精神结构的恒久。在排除了相对变化不大的“物质”干扰与纠葛之后，就历史上讲，可以对诗性精神方式在其各阶段的传承、关联、转化、飞跃作细部解读与具体考察，更真实和更完整地认识，理解诗性文化的历史运动。从哲学上讲，从精神方式视角观照中国诗性文化，也能把思维更多地凝注在人的心灵、情感、精神结构之上，使研究的对象微型化、具体化。

精神方式的生物基础在于人脑的思维结构。它虽然是在人类漫长的劳动实践中逐渐形成，但一经形成就有了独立存在的意义，后人可以从遗传中直接获取它。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还可以说，它也是人类与大地母亲同命相联的脐带或无线导体。在大脑这信息高密度的空间，这黑箱内部，必定珍藏着以往全部的宇宙历史和人类历史。因为人类是宇宙自然历史发展的最高成果，是已过去的全部运动、变化和过程的集合，只是对其中的机制与密码，我们目前尚未能认识或无法破译，这是我们无法弄清生命秘密的主要原因。弗洛伊德就认为，在“精神历程中，一旦形成了东西就不再消失；在某种程度上，一切都保存了下来，并在适当的时候，假如当回复倒退到足够的程度时，它还会出现。”^①因而在对精神方式的理解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是发生学。从这一角度去把握一种文化的精神方式，最值得重视的是该文化的精神本源、种族基础或人类学家讲的“原始思维”。进一步说，除了我们经常运用的“哲学思维”、“美学思维”外，要更多注重原始思维的特殊性格与特殊结

^① [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傅雅芳等译：《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8 页。

构。这是任何一个文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并始终伴随着它们文化生产与创造的全过程。同时它也是任何一个早期民族的深层文化结构，而每一种模式不同的民族文化则只是它历史的展开，前者以最为内在的方式影响、规定、制约着后者的历史与现实命运。在人类生活的分化、分工和社会演化进程中，以原始思维为内在基础生成的原始文化结构，始终作为一个基础存在并支撑着文明社会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与原始的思维、精神、文化相比，单独研究自我意识的哲学思维、单独研究审美意识的美学思维，乃至当下对原始思维已有的研究，都显得要单薄与偏狭，不可能充分、完整地再现出现人类最初的历史世界来。而只有深入理解了发生学意义上的原始思维，才能真正把握住一种文化的精神本体。

关于原始思维的理解与把握，最富于启示的是维柯的《新科学》。他指出，原始人由于推理力弱、想象力强，所以都是用“诗性文字”说话的诗人。因此，《荷马史诗》的真正作者并非盲诗人荷马，而是荷马时代所有的人。他将原始人的思维和精神方式称为“诗性智慧”，并提出古代各民族都是以“诗性智慧”的方式创造了最初的文化模式。维柯甚至还发现，“各门技艺和各门科学的粗糙的起源”，就是“一种诗性的或创造性的玄学”，“从这种粗浅的玄学中一方面发展出全是诗性的逻辑功能、伦理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发展物理知识、宇宙的知识、天文知识、时历和地理知识，这些也都是诗性的……”^①这是维柯思想中最闪亮的地方。抛开他研究中有时故意披上或意识中残余的神秘色彩，这段话相当明确地表达了，人类的古代文化或原始文化，大都是一种用诗性智慧创造出的诗性文化。因而，人类的这段历史也被维柯称为“诗性历史”，它与马克思曾指出的各民族早期共同经历过的神话阶段，在精神特征上也是极为一致的。由此对世界早期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大致可推演出这样一个原则：诗性智慧是早期各民族诗性文化的基因库（中国有《诗经》，古希腊有《荷马史诗》，印度有《梨俱吠陀》等），而诗性文化则是诗性智慧的历史展开。在这个展开过程中，只有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其亚细亚式的社会结构，得以全面、独立地延续和发展起来。

这就牵涉到从发生学角度把握精神方式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即早期经验对形成一个民族精神方式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以下我们将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知识材料进行一些探索。

3 诗的情结

维柯有一个基本的思想：一种东西的本性就是它的起源。西方 19 世纪

^① [意] 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5 页。



的人类学家承接了这种思想，他们认为：“一切都继续存在着，唯有形式发生了变化，一个事物的起源决定了它的本质。”^①这种观点初看起来颇具决定论色彩，但我个人认为，尽管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任何决定论都难免机械和独断，但就人类社会或精神的某一特定层面而言，有时它很可能正是我们把握一个对象最得力的武器。尤其在考察人类早期社会与精神状况时，由于其时人的主体性存在和文化的力量不仅不能与现代相比，相反还更多地受其生物禀性与自然环境的束缚与制约，因而文化决定论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恰好可以发挥其所长。对于中国诗性文化也是如此，它后来的一切内在结构与外在形态，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在其起源处就已经被决定了。也可以说，早在中华民族的童年时期，在其心灵深处就已然形成了一个强固有力、仿佛天性般的诗情结。

对此可从两方面加以了解。一是原始思维在文明世界中遗存下来的诗性智慧。综合维柯、列维·布留尔、斯特劳斯等人的社会学研究，大致可推断出这种思维与精神结构的主要内涵是情感化的或本能的、非逻辑的或前逻辑的、神话的或诗的。也可知这种诗性智慧在任何民族都从未完全被斩断，在文明时代中它在更多时候转化为诗人艺术家的灵感、想象力或其他艺术创造原动力。从柏拉图所谓的迷狂到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也包括中国文学艺术特别看重的直观、顿悟等，也都不是凭空而来，它们只能在诗性智慧中找到其发生的历史根据。对于以理性思维为主导的文明人来说，诗性智慧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先验的精神存在。

二是可以从人类的早期经验，或者说在文明发轫期中的精神体验和价值取向上找到一些重要的证据。在人类走向文明的历程中，原始思维或诗性智慧逐渐解体，理性的、逻辑的、科学的东西开始萌芽、发展，尽管这是大趋势，但由于不同的民族对此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这也是决定诗性智慧在人类精神结构中去留的主要原因。这一点至为重要。中国上古时代与政治、经济、祭祀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诗性文化，是使人类原初的诗性智慧在中华民族得以保存、延续的最重要的社会条件。而在古希腊，尽管他们也曾有过十分壮丽的奥林匹斯神话世界，但在经过了“智识即美德”的苏格拉底时代以后便异常悲壮地消失了。其标志是明丽的阳光，健康的情欲，诗性的崇高，日益被一种矫情的、疲惫的、世俗的生活所淹没和遮蔽。对这个古代诗性世界的悲痛，于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可见一斑。尼采说：“在这忐忑不安抽搐着的文化生活和教化斗争下面，隐藏着一种壮丽的

^① [德] 米夏埃尔·兰德曼著，张乐天译：《哲学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68页。

古老力量，尽管它只在非常时刻有力地萌动一下，然后重又沉入酣梦，等待着未来的觉醒。”^①而以尼采为发端，蔓延至今的西方反理性运动，都可以看作是古代诗性智慧一次次的苏醒。海德格尔甚至认为，西方人对存在的思考自柏拉图后就误入歧途、晦而不明了。这是诗性智慧与理性智慧断裂所造成的一个难以弥补的后果，所以海德格尔才努力要使他的哲学研究变成诗人的写作，唯有如此，才能拯救已不再“思”的西方形而上学。但在古代中国，文化变异却远没有这样严重。诗性智慧不仅没有受到来自科学和理性的挑战，旺盛的想象力不仅没有受到知性的改造，诗性文化不仅没有受到文明进程的摧残，反而由华夏先民以异样的热情充分肯定与接受下来，^②其标志是中国祖先对“诗”那种超乎一切的重视和崇尚。当古希腊智者柏拉图轻蔑地挑剔着《荷马史诗》的非理性和伤风败俗，严格地区别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时，在中国，诗却取得了绝对的权威地位。虽然孔子也曾删诗，但并没有将诗性智慧与理性精神对立起来，相反，却是使诗的功能日益扩张到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上。

检索一下古人的有关言论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尚书·虞书》：“诗言志。”^③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文子告叔向云：“诗以言志。”

《庄子·天下》：“诗以道志。”

《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

《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汉书·艺文志》：“古者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

自周至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期，始终都贯穿着“诗”这一精神方式，并随着传统文化在汉代的定型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本体。因此，罗根泽才指出：“在秦汉，则‘子曰’的势力，绝不敢与‘诗云’的势力对

① [德] 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01页。

② 在古希腊，公元前六世纪曾有过“诗歌和哲学之间的古老争论”（柏拉图）。这是希腊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宇宙学者和智者，为了维护他们的主张，对《荷马史诗》所代表的诗性智慧的一次文化围攻。具体参阅〔美〕尔伯特等著，夏乾丰译：《美学史》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9~10页。

③ 据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说，“诗言志”的说法大概在周代就有了。而周代恰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发轫期，可见“诗”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文化发生的一个标志。

抗”^①。这样，先验存在的“诗性智慧”与后天的诗的现实地位相结合，一同凝结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诗情结”。所谓“诗者，天地之心”（《诗纬》），所谓“大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周礼·春官》），所谓“诗无达诂”，以及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等，都是在表达诗这一精神方式既在万事万物之中，又超越它们而独立不改；既可以满足人的审美情感——庄禅的诗学，又能够用来进行道德教化——儒家的诗学；既不可解释，又有一确定的意义。虽然这些阐释在逻辑上看来显得不伦不类，但从诗性智慧的角度，它们几千年来却相安无事。这是在中国文化起源时就已决定了的。

这一心理情结的扩张，向社会的渗透表现在儒家诗学理论上，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对诗这一精神方式的文化功能的极端关注与弘扬，甚至以此排斥诗的审美功能。尽管表面上看来“诗不审美”令人奇怪，但实际上它所体现的恰是“诗性智慧”的本质。

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前者说明，孔子之诗，绝非今人作为文学形式的诗体，而是把诗看作是一种具有重要文化功能的精神方式。而古代中国人很少将诗作纯文学来看，正是中国诗性文化的必然产物，它表明诗的文化功能从一开始就压倒了诗的审美功能。而后者要表明的在于，不是不学习诗歌人就成了哑巴，而是说如果不能掌握“诗”的秘密，就不可能在政治、外交等场合正确、完整地表达自己的需要与愿望。诗在中国古代的这种存在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使人想到西方民族中统率万物的神性本体。

是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

在这里，诗这一精神方式将文化的政治功能、宗教功能、伦理功能集于一身，从而把诗在中国文化中的本体论地位与意义描述得淋漓尽致。而一切人文、精神、情感活动，也只有通过诗这一精神方式才能表现出来：

^①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诗品序》）

不仅如此，所有中国民族的苦难和欢愉，也只有通过“诗”这一途径才能上升到澄明之境。

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文赋》）

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

天地之生是山水也，其幽远奇险，天地亦不能一一自剖其妙，自有此人之耳目手足一历之，而山水之妙始泄。（叶燮《原诗》）

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叶燮《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

这也能见出中国文学艺术的审美真精神。主体、笔墨、形迹、形式都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凌驾于其上的某种精神存在。总之，一切都要围绕着这个精神本体而存在。由此可知，先验遗存的诗性思维方式与早期重要的文化导向统一集中起来，形成一种无比强大、亘古不衰的心理能量与心理原型，这就是中国文化在人类世界中独一无二的诗情结，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如此强大与有力，以至于在很多方面直接改变了传统文化向前发展的历史途径。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文学艺术，都是在这一精神本体的影响与支配下发展起来，走向繁荣或走向凋零的。

4 天地之心

在古代形成的这种诗性情结，作为一种华夏民族的精神方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本体，必然要以现实规范或种族无意识的方式，渗透、凝聚在其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独立的各个分支，影响、制约、改变着